

鄂东乡村地名的认知语义阐释与乡愁记忆的建构机制研究

项璇钰*, 曹卓雯, 杨欣烨#

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 湖北 黄冈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2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9日

摘要

鄂东地区作为“江西填湖广”的重要迁入地与荆楚文化的交汇带, 其乡村地名不仅是地理空间的标识, 更是承载地域历史、生态智慧与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隐喻、意象图式、范畴化及人文地理学的地方感理论入手, 对鄂东乡村地名进行认知语义阐释。研究发现, 鄂东地名通过概念隐喻将乡愁与具象凝固起来, 通过意象图式为乡愁记忆提供空间线索, 通过分类与范畴化, 塑造了乡愁和地方感知的秩序。乡村地名的这些认知机制使它可以将抽象的地理空间转化为可被理解、体验和回忆的“地方”。文章提出, 在城镇化背景下, 乡土地名的调整可能使乡愁记忆面临断裂的风险, 因此, 我们应该保护乡村地名。

关键词

乡村地名, 认知语义, 乡愁记忆, 保护

A Study on the Cognitive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of Rural Place Names and the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Nostalgia Memory in Eastern Hubei

Xuanyu Xiang*, Zhuowen Cao, Xinye Y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Huanggang Normal University, Huanggang Hubei

Received: April 27, 2026; accepted: May 29, 2026; published: June 9, 2026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项璇钰, 曹卓雯, 杨欣烨. 鄂东乡村地名的认知语义阐释与乡愁记忆的建构机制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6): 313-321. DOI: 10.12677/ml.2026.146528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destination for the “Jiangxi Filling Hubei and Hunan” migration and a convergence zone of Jingchu culture, the rural place names in the eastern Hubei region are not only geographical markers but also cultural symbols that carry regional history, ecological wisdom and collective memory.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gnitive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of rural place names in eastern Hubei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etaphor, image schema, categorization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the sense of place theory in human geography.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place names in eastern Hubei solidify nostalgia and concrete images through conceptual metaphor, provide spatial clues for nostalgia memory through image schema, and shape the order of nostalgia and local perception through classification and categorization. These cognitive mechanisms of rural place names enabl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bstract geographical space into a “place” that can be understood, experienced and recalled.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the adjustment of local place names may pose a risk of breaking the nostalgia memory; thus, we should protect rural place names.

Keywords

Rural Place Names, Cognitive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Nostalgia Memory, Protec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地名研究历史悠久，传统地名学主要关注地名的语源考证、命名理据、历史沿革与地理分布，属于历史语言学与历史地理学的范畴。学者们系统梳理了地名中的山、水、林、田等自然景观要素以及宗族姓氏、祈愿盼望等人文信息，揭示了地名的文化价值[1]-[4]。与此同时，人文主义地理学开启了地名研究的情感与体验维度。段义孚(Yi-Fu Tuan)提出的“地方感”理论，强调地方是由经验、意义和情感赋予价值的空间[5]。地名正是将“空间”转化为“地方”的核心符号之一，它承载着人的情感依附与身份认同。地名作为社会记忆或集体记忆的重要产物和构成要素，本身就是浓缩的、象征性的记忆焦点[6]。国内关于“乡愁”的研究，多从社会学、民俗学与文化遗产角度切入，关注其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情感价值与文化修复功能[7]，但较少深入剖析其内在的认知运作机制。

认知语言学的兴起，特别是认知语义学的发展，为弥合地名研究与乡愁记忆的情感维度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工具。莱考夫与约翰逊(Lakoff & Johnson)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揭示了人类如何通过身体经验来理解抽象概念。兰盖克(Langacker)的意象图式理论，阐明了空间关系在概念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菲尔莫尔(Fillmore)的框架语义学则强调，理解一个词的意义需要激活与之相关的整个认知框架网络[8] [9]。这些理论为理解地名如何作为一个认知入口，从而触发一整套与地方相关的体验、知识与情感，提供了精细的分析框架。

本研究聚焦鄂东地区，其地处大别山南麓与长江之间，地名兼具山、水、圩、冲等丰富地理特征，同时历史上这里是“江西填湖广”移民运动的重要接纳地，地名呈现出融合性特点，且近年来城镇化与行政村合并进程明显，地名变化较多，所以鄂东地区可以成为观察“认知断裂”现象的典型区域。本文地

名案例选取遵循以下原则：1) 历时性：地名经历了明确的合并、替换或雅化；2) 代表性：能分别体现地形、宗族、历史、产业等不同命名理据；3) 可获得性：在官方文件与地方文献中有明确记载。

数据来源主要包括：1) 官方文献：1982~2022 年之间的官方地名志；2) 数字资源：中国地名信息库、百度/高德地图的历史影像与地名库；3) 田野补充：对部分典型村落，如团风县回龙山镇、蕲春县漕河镇等相关村落进行了非结构化的线上访谈与地方性知识搜集，以验证地名内涵与居民认知。研究共分析了 1982 年以来鄂东地区因城镇化进程而变化的约 2000 个乡村地名，并从中筛选出 356 个具有典型认知断裂特征的案例进行深度剖析，基本覆盖了该地区地名变迁的主要类型。

地名被称为“历史的活化石”，其不仅是一种语言符号，同时也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产物。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大量自然村落消失或合并，乡村景观发生巨变，地名作为连接个人与故土的情感纽带，则成为维系乡愁的重要线索。因此对鄂东乡村地名进行认知语义层面的深度阐释，不仅有助于揭示当地人认知世界的方式，帮助我们深入阐释其乡愁记忆建构的核心机制，更能厘清地名如何通过语义编码建构起群体的乡愁记忆，为当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与地名保护提供理论支撑。

2. 乡村地名的隐喻固化与乡愁情感的凝结

认知语义学认为，人类并非直接地理解抽象概念，而是通过一套根植于身体与空间经验的“概念隐喻”系统，将无形的情感、时间、道德等抽象域，投射于有形、可感的具象域之上。乡愁作为一种复杂的抽象情感，它的理解与表达深深地依赖这套隐喻系统。乡村地名正是隐喻认知过程在文化地理层面留下的鲜活记号，它将人们对于自然环境、族群命运与生活理想的感知与期盼进行概念化的编码并永久地凝固起来。

2.1. 自然环境是乡村地名最原始的隐喻来源

地名作为人类对地理空间认知与命名的直接产物，其生成逻辑深深植根于先民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实践。鄂东地区的多样地貌首先成为当地居民进行空间命名时最为直接和丰富的“语义库”。通过隐喻这一基本的认知机制，鄂东先民将自然地貌的形态、特征与自身熟悉的具身体验和日常物事相联系。

隐喻命名的核心在于“相似性”联想。鄂东乡村地名中存在大量将自然地貌形态隐喻为人体部位、动物形体或日常器物的例证，生动体现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原始思维。包括众多以“嘴”“口”“头”“颈”命名的地方，如蕲春的“鸭公嘴”、团风的“磙矶口”，这些名称是将山体伸向水域的突出部分或两山之间的关隘比作动物的喙嘴或人体的咽喉，强调了其地形上的“突出”与“要害”特性。还有以“岭”“岗”“墩”命名的地方，如“角儿岭”“凉亭岗”“龙王墩”，则是对丘陵地貌形态的直观摹写，将其隐喻为隆起之物。更为复杂的隐喻则体现在对整体地形的象形概括上，如“龟峰山”“凤凰山”“象鼻地”等地名，是将山体的轮廓与神态，通过集体想象，与龟峰、吉祥的凤或象鼻相联结，使得抽象的地理特征获得了具体可感的形象。这类命名不仅是简单的标签，也反映了人类希望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望。

自然界的动植物与矿产也成为地名隐喻的来源。以显著植被命名的如“柏树林”“茅竹林”“竹根塘”，以特色动物命名的如“白鹤湾”“金鸡岭”，以特有矿产命名的如“铜绿山”“铁矿岭”等。这类地名不仅标识了地点，更隐喻了该地的生态特征与资源禀赋，具有实用的指示功能。例如“铜绿山”直接揭示了其铜矿资源的丰富，地名在此时便成为一部浓缩的自然资源档案。

鄂东乡村地名中对自然环境的隐喻性运用，是先民在特定生态空间中，运用具身认知与生活智慧，对天地万物进行的一次系统性、文化性的“编码”。这些地名将自然的地理特征转化为文化的记忆符号，为后续的社会历史叙事与乡愁情感投射，奠定了最为原始而稳固的语义基石。

2.2. “空间位移与归返”地名概念隐喻的乡愁

地名不仅是静态的地理标识，更是一套动态的认知与情感系统。在乡愁的建构中，以“空间位移与归返”为核心的隐喻机制，可以通过地名这一符号媒介，得以具象化与结构化。在此过程中，人们通过具体而熟悉的经验域来理解抽象而复杂的经验域，因此，地名概念便既能隐含空间位移，也可标注情感归返，它将物理空间的变动与心理情感的流动紧密耦合，构成了乡愁体验的基本认知图式。

“空间位移”的隐喻首先体现在移民地名上。鄂东地区存有相当数量的与江西原籍地同源或相关的地名，如黄石大冶的“南昌村”、阳新的“玉垅村”、黄冈浠水的“散花洲”，还有鄂东地区广为流传的有关“瓦屑坝”的故事，虽然鄂东本地没有直接叫“瓦屑坝”的村镇，但这个地名在鄂东乃至整个湖北的移民家族记忆中代代相传，是许多家族追溯祖籍的共同符号[10]。无论是直接的命名还是故事的流传，地名本身成为了这次位移的终点坐标与记忆凭证。当人们提及这些名称以及背后的故事时，人们心中“从彼处移居此处”的完整位移叙事便被激活了。这种叙事内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使得乡愁首先表现为对“位移”本身的铭记，对“来自何方”这一根源性问题的永恒追问。地名在此便承载了移民群体跨越地理空间的历史轨迹与乡愁记忆。

“归返”的隐喻则更为复杂，它往往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回归，而是一种通过地名符号进行的心理与想象上的精神还乡。当游子身处异乡，故乡的某一个具体地名，如“枫树村”“白石头湾”等，它们在心理上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刺激点，这个地名所指向的，并非地图上的一个点，而是一个由童年记忆、感官经验、人际关系构成的完整“地方感”。思念故乡时，游子的心智会沿着“地名”这一符号通道，进行一种逆向的、想象性的“心理位移”，瞬间“归返”到记忆中的“彼处”。这种归返是通过对地名所激活的场景、故事与情感的沉浸式想象来实现的。

因此，地名是“空间位移与归返”这一核心概念隐喻得以运行的关键符号。它凝固了历史上的物理位移，又为当下的心理归返提供了精确的坐标与鲜活的素材。在乡愁的复杂情感网络中，地名构建了一条可被反复追溯的认知与情感路径。通过地名这个媒介，乡愁不再是模糊的感伤，而是一种有源可溯、有径可循的、结构化的情感认知模式。

3. 乡村地名通过意象图式为乡愁记忆提供空间线索

意象图式是人类基于身体与空间互动形成的基本认知结构，是我们组织经验的线索。乡村地名往往直接命名或标示了这些图式在物理景观中的体现，从而为乡愁记忆搭建了清晰的空间框架。

3.1. “容器”图式与内外边界

在诸多意象图式中，“容器”图式对乡愁记忆的建构尤为重要。它源于我们最原始的身体经验：身体本身就是一个有内外之分的容器。乡村地名通过激活和固化“容器”图式，为流动的乡愁记忆赋予了清晰的空间结构与情感边界，使其得以被有序地组织、储存与唤起。

乡村地名在空间上天然地划分了“内”与“外”，从而定义了乡愁的“情感容器”。一个具体的村落名称，如“鲁家湾”，其首要功能是划定一个具有明确心理边界的空间单元。在认知层面，“鲁家湾”这个地名所标示的，不只是一个地理范围，更是一个心理和情感的“容器”。容器内部是熟悉、安全且有序的“家园世界”，容器外部则是陌生且充满未知的“外界”。乡愁的核心正是建立在这一基本的“容器”图式之上。当游子思念故乡时，他所思念的正是“鲁家湾”这个“容器”内部所包含的整套人、事、物及其形成的整体氛围。

地名所建构的“容器”还具有层级性。如从更大的地理范围“蕲春县”，到中间层级的“刘河镇”，再到具体的“老祠堂”“村口井”，这些地名共同形成了一个由大到小、层层嵌套的“容器”系统。每一

层级的地名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记忆容器，储存着不同程度的记忆内容：“蕲春”可能关联着地域文化认同；“刘河镇”关联着宗族血缘；而“老祠堂”“村口井”则承载着更具象的情感与事件记忆。乡愁往往是在这些不同程度的“记忆容器”之间展开。这种层级结构，使得乡愁记忆既有宏观框架，又不乏具体支点，成为一个丰富而有序的整体。

3.2. “路径”图式与线性叙事

“路径”图式是人类经验中最为基础的意象图式之一，它源于我们从一处移动到另一处的身体体验，包含起点、路径和终点等基本要素。在乡愁记忆的建构中，乡村地名成为构成动态“路径”的关键节点。通过激活“路径”图式，这些节点将离散的地理空间串联为富有时间性与方向性的线性叙事，使得个体的生命历程与集体的迁徙历史得以在空间的维度上被有序地展开。

乡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复性行为路径，可以通过地名被固化为充满温度的线性记忆。例如，从“毕家老屋”到“三里畈”的劳作之路，从“坳上湾”到“三易塘”的汲水洗衣之路，从“祠堂”到“学堂”的成长之路，连成了日常生活的路径。每一个地名都是这条日常活动中的一个站点，关联着特定的感官与社交记忆。这条由熟悉地名串起的个人生命路径，构成了乡土经验的内在秩序。乡愁在相当程度上是对这种有序的、可预测的日常路径及其所承载的安全感的怀念。当游子回忆故乡时，脑海中浮现的往往不是孤立的地点，而是沿着这些熟悉路径展开的一连串场景与故事。

前文所述与移民相关的地名同样也反映了“路径”图式，那些以“铺”“驿”“店”为通名的地名，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移民与商旅路径。这些地名如同叙事中的路标，标记了祖先从江西出发，经水路、陆路辗转，最终抵达鄂东落脚安家的时空轨迹。当后人提及“界岭”“宋埠”这些地名时，人们的脑海中便串联起一条集体迁徙的路线。这条“路径”叙事超越了地理意义，成为家族与地域认同的源头故事，这种追根溯源的心情正是乡愁的体现，人们也正是沿着这条由地名标记的符号路径向起点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精神回溯。

3.3. “连接”图式与关系网络

在乡土社会中，地名绝不仅是一个个单独的空间标签，它们通过“连接”图式，编织成一张涵盖社会关系、经济交换、文化交往的复杂网络。鄂东乡村地名以其丰富的通名与人文内涵，清晰映射并维系着这张关系网络，使乡愁记忆超越对单一地点的眷恋，升华为对一整套有机社会关系与生活世界的怀念。

血缘与宗族的连接是这种图式最核心的类型。大量以姓氏命名的聚落，如“彭家畈”“陈家塹”“程德岗”等，其名称本身就宣告了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共同体。地名成为了宗族认同的空间符号，内部成员共享这些地名，意味着共享祖先、族规与集体记忆。更高层级的连接则体现在地名序列中，例如，“童家冲上垮屋”“童家冲中垮”的地名组合，直观地展现了同一宗族下不同房支在空间上的分布与谱系上的亲疏关系。个体对家族的归属感与历史感，正是通过这些地名的连接而得以定位和确认。乡愁中对“族人”与“老屋”的思念，正是对这种血缘网络连接的情感依附。

地缘与经济的连接则通过地名展现了乡土社会的生计网络与市场体系。鄂东地名中的“渡”“铺”“店”，是交通与商业连接的关键节点。它们标志着人流、物流的汇聚与流转，而“畈”“冲”这类指代成片田地或山间平地的地名，则连接着耕种与生产的空间。这些地名共同勾勒出一个自给自足又与外联通的经济地理网络。乡愁中“热闹的集市”“熟悉的田埂”等意象，本质上是对这种有机经济生活与地缘交往关系的怀念。

3.4. “中心 - 边缘”图式与情感梯度

“中心 - 边缘”图式将空间结构化为具有不同重要性与情感强度的层级体系。在鄂东乡村的地名景

观与乡愁记忆中，这一图式深刻体现为以特定核心地名为情感中枢、依空间与功能距离形成情感梯度关联的现象。地名不仅标识位置，更通过“中心-边缘”的隐喻，塑造了乡愁的强度分布与认同的深浅结构。

在乡村聚落内部，地名的命名逻辑清晰勾勒出“中心-边缘”的社会空间结构。祠堂、稻场、老井通常构成聚落最核心的情感与文化中心。以“祠堂”为核心，其周边地带往往被视为聚落的精神与权力中心，地名也常与之相关，如“祠堂边”，这里承载着最厚重的宗族记忆与集体认同，是乡愁情感浓度最高的“中心”。向外一层，是“稻场”“大塘”“水井”等公共活动与生活空间，它们构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关联着生产协作、日常交往的生动记忆。而“后山”“河对岸”“塘角”这类地名，是生产或采集的边缘区域，承载的记忆相对零散，情感浓度也较低。乡愁往往首先并最强烈地从中心地名向边缘地名扩散。

“中心-边缘”图式在聚落之间同样显著，形成了层级化的地域认同网络。在传统社会，“镇、埠、店”因其集市、码头和行政功能，成为多个乡村聚落共同的经济与社会中心。而“塆、塘、畈”则围绕这些中心散布于各个聚落。这种层级关系会直接影响乡愁的结构，如对于乡民个人而言，他对从小成长的“塆”的情感是核心且充满细节的，而对于“埠”的情感则更多是功能性的，这便体现了一个从高层级中心到基层边缘的清晰序列。

4. 地名通过分类与范畴化，塑造了乡愁和地方感知的秩序

地名系统通过系统性的分类与范畴化，为混沌的自然空间赋予了清晰可辨的秩序，并将这种秩序内化为当地居民感知世界、组织经验、建构认同的基本框架。对于乡愁而言，这种被地名所塑造的认知秩序，构成了记忆得以被存储、提取和情感化的深层结构。

4.1. 通名系统为乡愁的认知秩序提供了基本框架

乡土地名的力量，首先体现在其丰富的通名系统上。鄂东地区常见的通名有“塆、垄、冲、畈、宕、咀”等，它们是乡民们基于千百年生产生活经验，对复杂地貌与聚落形态进行的高度概括和分类。每一个通名，都代表一个特定的空间范畴，蕴含着关于地形、水文、功能乃至社会关系的整套“地方性知识”。

“塆”(湾)指山间或河畔的弯曲平地，通常三面环山或水，一面开口，易于聚居防御，是理想的定居点范畴。“垄”指两山之间狭长的带状平地，是主要的耕作区域。“塆”是“家”的所在，是居住、社交、宗祠所在的中心，“垄”是“田”的所在，是劳作、产出的生产类范畴。乡愁中对家园的温暖记忆，总与“塆”里炊烟、屋舍和人际网络相连。而对“田园”的怀念，则与“垄”上四季劳作和泥土气息相关。地名通过“塆”与“垄”的范畴区分，预先为乡愁记忆的秩序化打下了基础。

“冲”通常指比“垄”更短、更窄的山间小谷地，而“畈”则指较大的成片水田区域。“上冲”“下冲”“三里畈”“王家畈”同样与人们的社会关系相关联。记忆中的“冲”，可能关联着零散的自留地、采摘和相对私密的活动，而“畈”则关联着大规模协作灌溉、集体劳作和更广阔的公共视野。地名范畴的差异，直接导致了感知与记忆的差异。

乡村的通名系统，共同构成了人们理解乡土空间的认知基础，并能在脑海中快速构建出各地的空间关系、功能属性乃至社会生态。通名通过分类将连续的地理环境切割为有意义的、可管理的认知单元。乡愁正是对这些有序单元及其所承载的整套生活方式的怀念。

4.2. 专名是形塑地方独特乡愁记忆的核心符号

以通名提供的秩序框架为基础，专名为乡愁的形成提供了独特的语言符号，它完成了从一般范畴到

具体地方的个性化与情感赋值。这种命名行为，是乡愁情感得以聚焦和深化的核心机制。

专名通常直接抽取地方最显著的自然或人文特征，将其凝固为名称。以地形命名的“鹰嘴岩”“薄刀峰”，以水文命名的“温泉大道”“白潭湖”，以植被命名的“松山”“桂花湾”，以物产命名的“铁铺陆”“陶店”，以建筑命名的“花桥”“古塔”等。这些专名如同一个高度精炼“记忆标签”，让人一听便能抓住该地的核心特征。乡愁中对某个具体地点的思念，往往首先被这些专名所唤起的特征意象所填充，当游子思念“桂花湾”时，鼻尖仿佛就萦绕着金秋的甜香，当想起“温泉大道”时，马上就能联想到温暖的泉水。地名通过专名，将抽象的地方转化为一系列可被感官直接触及的鲜明特质。

更重要的是那些承载着传说、历史与个人故事的专名，如“望夫山”“哭天河”“舍身岩”“晒书堂”等。这些地名将动态的事件、深厚的情感、集体的价值观，永久地投射在静态的地理坐标上。它们不再是普通的地形地物，而是成为了“故事展开的地方”，是地方历史的纪念碑和道德教育的活教材。当人们提及“望夫山”，谈论的不仅是一块石头，更是忠贞的爱情叙事，说起“晒书堂”，关联的则是对文脉与知识的尊崇。这类地名，为乡愁注入了超越个人经验的、深沉的历史感与文化重量。个人的乡愁由此与地方的集体记忆和深层文化心理相连，获得了更宏大的意义支撑。

地名通过其精密的分类体系和个性化的特质赋予，为当地人建构了一整套稳定而有序的地方感知秩序。这套秩序，是人们理解乡土、开展生活、建立认同的认知基石。当人们离开故乡，乡愁的产生，在本质上是对这套内化有序的认知系统的深深依恋。

5. 地名变迁、认知断裂与乡愁的当代困境

在急速的城镇化与行政区划调整中，地区大量古老、生动、富含认知内涵的乡村地名被合并、简化或取代，这间接导致了深刻的“认知断裂”与“乡愁失语”。

5.1. 命名理据的丧失与认知链接的切断

有些地名调整以后可能会丢失原有的命名理据。如黄梅县原“陈圩村”“段圩村”“张湖村”合并后，命名为“长乐村”。原村名中的“圩¹”和“湖”直接反映了该区域“围湖造田”“水网圩区”的生存环境与农耕智慧，而新名“长乐”是一个全国通用的吉祥语，虽寓意美好，却是一个空洞的认知框架。它无法承载“陈姓筑圩”“张姓临湖”的家族拓荒史，也无法唤起对具体水域、堤坝的乡愁记忆，导致地方知识的独特性被泛化的区域标签所取代。

蕲春县的漕河镇在行政村合并过程中，将原“槐树山村”与“黄婆坳村”并入新的“飞跃村”。“槐树山”与“黄婆坳”这类地名蕴含着鄂东乡村典型的三重认知维度：一是生态特征，“槐树”指向具体的植被景观，“山”与“坳”标记了聚落所处的山地与洼地地形；二是人文记忆，“黄婆”可能指代某位黄姓女性先祖或地方传说；三是空间方位，“坳”常用来描述低洼处的地理特征。当这些地名消失时，其所承载的地理感知、历史叙事与空间模型便从公共标识中退场了。

5.2. 隐喻图式的消解

有些地名的变更意味着认知模型的转变。如黄梅县的小池镇原“马埭村²”与“板桥畈村³”合并后，更名为“东风港村”。原名“马埭”构建的是一个“容器”图式，即田埂作为边界，内部是受保护的农田与家园，隐喻着构筑安全空间的生存智慧。而“东风港”则转向了一个“路径”图式，强调线性交通的连接功能。这种命名逻辑的转换，在认知上是从一个基于独特生存经验的、具身的“容器”世界，滑向一个

¹“圩”这个通名指防水护田的堤岸。

²“埭”指堤内田埂。

³“畈”指成片田地。后文的“冲”指山间狭长平地。

普遍化的、基于基础设施网络的命名系统。乡愁所依附的那个由田埂、田畈、水系构成的独特认知模型，被一个同质化的“港口”概念所覆盖。

团风县贾庙乡原“长冲村”与“李家边村”合并后，更名为“牛车河村”。虽然“河”保留了部分水文信息，但“长冲”所蕴含的“山间走廊”这种线性的受山体约束的空间图式便被弱化了。地名从描述“我们居住在山冲里”的静态空间属性，转向了“牛车”这一运输工具的动态叙事，原有的地理约束感与避世感便随之消解。

5.3. 乡愁记忆符号提取的失效

地名是乡愁记忆的检索符号，符号的更换也意味着记忆提取的失效。

蕲春县蕲州镇在 2023 年原“打鼓台村”“街口村”“两路口村”合并为“大畈头村”；原“枫树岭村”“西角湖村”“土台村”“沙径村”合并为“赤龙湖村”。对于老一辈居民来说，“打鼓台”可能关联着击鼓传讯的历史传说或地形高台，“沙径”指向一条具体的沙土小路。当这些具象的旧符号被“大畈头”“赤龙湖”等新符号取代后，与之绑定的个人生命故事，如在“打鼓台”放牛、在“沙径”赶集等便失去了乡愁记忆提取的入口。新一代居民使用新地名建立认知，他们脑海中的“赤龙湖村”可能仅是一个旅游目的地，而非承载祖辈耕作记忆的“沙径”与“土台”，原有的“地方感”传递便会出现断层。

黄梅县濯港镇原“李垄村”与“黄竹林村”合并后，更名为“光明村”。“李垄”指向李姓家族聚居的田垄，“黄竹林”指向一片具体的植被景观，二者都是可触可感的实体记忆。而“光明”无法作为索引唤起任何具体的例如泥土味、竹叶声等感官记忆，这同样会导致乡愁记忆提取机制的失效。

6. 结论与展望：保护地名，即是保护认知世界与情感家园

本文从认知语义学的视角出发，结合鄂东地名实例，揭示了乡村地名是系统性的“意义-记忆”复合体。在隐喻层，地名是乡愁的概念化凝固符号。在图式层，它构建了记忆的空间骨架。在范畴层，它通过通名和专名确立地方感知秩序。而在实际的现实情境中，相当数量的乡村地名变迁导致认知链接断裂、记忆符号提取失效，乡愁陷入“无处安放”的虚空化。

因此，地名保护本质是守护一种独特的认知世界方式与情感生成机制。未来实践中，应在规划中优先保留历史地名，在教育中解读其认知内涵，在数字化中构建“记忆地图”，使每个地名成为重返精神家园的路径与入口。

基金项目

2021 年度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乡村记忆视角下鄂东地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1Q262）；2025 年黄冈师范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文旅融合视域下地名活化驱动‘东坡黄州 IP’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路径与实践探索”（项目编号：2025DC008）。

参考文献

- [1] 牛汝辰. 中国地名文化[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3.
- [2] 孙冬虎, 李汝雯. 中国地名学史[M].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7.
- [3] 华林甫. 中国地名学源流[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 [4] 杨欣焯. 近 60 年来中国地名学发展概观[J]. 学习月刊, 2013(16): 13-14.
- [5] Tuan, Y.F. (2001)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s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6] 张佳蕾, 杨效忠, 李冬花, 等. 符号学视角下地名文化旅游的研究框架[J]. 中国生态旅游, 2024, 14(5): 935-950.
- [7] 纪小美, 崔会芳, 陶卓民. 社会记忆视角下的南京城市街巷地名变迁[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11): 1692-1700.

- [8] 王寅. 认知语言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 [9] 束定芳. 认知语义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 [10] 徐斌编. 明清鄂东宗族与地方社会[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